

“中安”轮沉船事件始末

——纪念“中安”轮牺牲烈士73周年

□《溧城镇志》办公室 文/图

1945年抗战结束后,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谈判,签订了《双十协定》。为履行重庆谈判协定,表达诚意,争取先机,我党决定让出浙江、苏南、皖南等8块根据地。9月下旬开始,分批将苏浙军区指战员和苏浙皖边区根据地干部撤退到长江以北。

9月19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电告延安:将“浙东、苏南、皖南、皖中部队北撤”,要“越快越好”。并特别说明:“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,且有好影响。”

新四军军部接到撤退命令后,立即对苏南部队北撤进行部署: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、三纵队,作为第一批迅速北撤;叶飞、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能转移的部队、地方干部和尽可能随带的辎重作第二批转移;少数主力掩护撤退,作为第三批部队北撤。第一批北撤部队顺利过江。10月11日,第二批北撤部队由叶飞、金明率领,经宜兴、溧阳、武进等地,往孟河、小河镇一线移动渡江,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。第三批在政委韦一平率领下,共1000多人,于10月14日夜到达渡江始发地点武进县的荫沙。

据幸存者叶春荣同志回忆:1945年10月14日,我们踏上了北撤的征程。军事行动历来严格保密,部队趁着夜色出发,途中经过封锁线便小跑步快速前进。我们既然是偷渡,不可能利用大码头,也不能利用性能较好的民用船只,因为大码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,好船都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了,只能用渔民的小渔船或者租用那些老旧被淘汰的轮船。

在第三批渡江时,当时考虑使用渔船偷渡,一只小船只能搭载10到20人,现有的1000多人需要70多条船才能运完。一来筹集这么多船并不容易,二来这么多船渡江比较惹眼,很容易被国军巡逻船发现。经过再三考虑,政委韦一平等人决定,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“镇江——泰兴口岸”线的“中安”号渡轮。

对于“中安”轮船的具体情况,韦一平他们都不太了解,仅仅听信了该船虽老,但经常在这段长江中来回航行的情报。实际上,这艘民国初年建造的老式轮船已经运营了30多年,设备和船体都已严重老化,尤其是船底的部分钢板已经腐朽穿孔,行驶时船底会少量漏水,必须边航行边排水。不过,漏水并不算太严重,只要排水及时,不会影响在长江中来回轮渡。当时“中安”轮的船主曾考虑将船开到上海去修理,但由于修理船的代价过高,需要更换大量部件,也就放弃了。该船当时基本处于等待报废状态,已经不能继续运输。如果不是这样,这艘轮船也不可能被新四军所征用。

“中安”轮虽已严重老化,船底有些漏水,只要排水及时,在长江中再进行1到2次运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并且前几天已经来回运输七八次了,也没出过事。鉴于这样的分析,就决定租用“中



安”轮实施第三批渡江。

据幸存者陈瑞洪同志的回忆:10月14日晚上十一点多钟,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。因为“中安”轮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,所以船不能泊岸,我们上船只能用小渔船一船一船地短距离驳运到“中安”轮上。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、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(大多是女同志,被服厂女工约200—300人)及干部大队,共约1000多人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小渔船驳运,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登上“中安”轮船。

人员全部上船后,“中安”轮拉响了汽笛,轮船慢慢离开了江边,不久就加速前进。当时,江面上大风呼啸,江浪拍船,不时有水珠打在我的脸上,夜色中什么都看不到,不知是下雨还是江上溅起的浪花。

由于连续几天的急行军,极度疲劳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,风声、鼾声、马达声交织在一起。

“中安”轮最多只能搭载600人左右,这次却搭载了1000多人。严重超载导致“中安”轮吃水比平常深得多,破旧的船底钢板根本无法承受严重超载的重量,给航行安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。此时江面上又刮起大风,水流也因为连日大雨变得更急。启航不久,有船员发现船底进水远比平时严重,排水赶不上进水的速度。但“中安”轮毕竟很大,如果硬着头皮前进的话,还是有可能到达对岸的。

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,船底钢板突然大面积破裂,一时间江水汹涌进入底仓,船员们奋力排水,根本无济于事。船员们无奈,就立即向政委韦一平汇报,韦一平急忙调动一部分官兵来排水。可是轮船太老,仅靠官兵、船员用水桶排水,根本没有什么作用,江水还是不停地从船底冒出来。

据叶春荣同志回忆:当时长江风很大,大风掀起的江浪不断地拍打着船体,发出很大的响声,大家都屏着气,谁也不讲一句话。突然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了,大家顿时慌乱起来。韦一平带着警卫,上下走动交待坐船的军事纪律,他对大家说:“同志们,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江中间了,船底有点漏水,不要紧,再坚

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,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,不听指挥,坚决按军纪处置!”命令下达后大家的情绪才暂时平定了下来。

可是,船只沉没速度远远超过韦一平的预计,船底漏水更快,已经无法挽救。船员们逃到甲板上,放弃了排水,官兵没有人指挥也只能放弃排水。此时船体失去了重心,严重倾斜,左倾时人们向右奔跑移动,右倾时又向左移动,局面完全失控。部分船员和官兵开始跳水逃生,船长连续拉响汽笛求救。

“中安”轮在没有全部沉没前,还有一段烟囱露出水面,沉船时间很快,最初烟囱还是滚烫的。但就是这段烟囱上,也有10来个人一直抱着不肯撒手。

时间过去只有10多分钟,“中安”轮就完全沉没了。船上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、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、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、溧阳县县长徐鲁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、宣教科长王一、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800多人,船沉没时全部牺牲。

“中安”轮上惨烈的呼救声,竟然越过宽阔的长江,惊动了对面天星桥附近的渔民。当时渔民丁广田就睡在江边的渔船上,他曾经帮助前两批新四军北渡,前后忙了七八天,已相当疲劳,当他听到呼救声以后,立即叫醒江边的另外几只渔船上的渔民前往救人。此时风大浪急,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,几只渔船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喊声判断方向,最终只有丁广田一只渔船率先赶到出事现场开始营救。由于丁广田的船太小,一次只能运载21人,如果再营救多人,船就要沉。有过水中救人经历的人都知道,落水的人会本能的抓住任何东西,哪怕是一根稻草。这对于来救人的船只是非常危险的。于是,丁广田在水中救了20多人后,就立即将渔船向岸边划去。当他准备再次返回营救时,另一只刚刚赶到现场营救的小渔船,瞬间就被几十人抓住船身,导致翻覆。船老大靠着极好的水性,抱着船桨跳入水中才得以逃生。

丁广田第二次返回营救时,由于渔

船实在太小,载人后船舷已经接近江面,如果再上人,随时可能沉没。他只得将绳子抛到江里,让落水的战士拉住绳子,拖着他们往岸边移动,这样又多救了几十人。

丁广田的小渔船第三次返回营救的时候,连烟囱也看不到了。他们将少数抱着漂浮物浮在江上的官兵救起。这样前前后后一共救了100多人。

牺牲的烈士中职务最高的是政委韦一平,据警卫员回忆:当时船马上就要沉了,我找到一块木板,让政委赶快跳水逃生,他却说自己年纪大了,而且脚有残疾(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,韦一平左脚被子弹击穿致残),游不了水。他让我先走,我不同意,他就说那我们两人一起走,让我先抱着木板下水。我说这么小的木板救不了两个人,政委说可以的,你抱着就是了,我刚抱住木板,政委突然从背后用力将我推入江中,江水一下将我冲走几十米远,当时我就哭了出来,政委明白木板只能救一个人,他牺牲了自己救了我。我在江里漂浮了很久,才飘到岸边被救。

据叶春荣同志回忆:“中安”轮即将沉没时,求生的本能使大家纷纷跳水逃生。我坐在船帮,翻过一块栏板就跳进江中,凭着儿时在家门口河塘中学会的游泳技术,在江水中一阵乱划,碰巧搭到固定沉船烟囱的铁丝,就抓着不放,与我同时搭上这根铁丝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。此时,我的身体负荷越来越重,原来背心衣袋内所带的票据、抗币等都吸足了水,加大了重量。10月份江水温度下降得很快,虽不是寒冷彻骨,但人也冻得够呛。风急浪高,流水湍急,漩涡一个接着一个,将落水者的身体在江水中裹来转去,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。不知飘了多久,两只小木船赶来营救,我被人拉上了船,精神一放松便昏了过去。等船靠岸,我被营救的人唤醒扶上了岸。有的获救者只穿了一条裤衩,冻得直哆嗦。营救者便用稻草堆起来,点燃火,为被营救上岸的十几名同志烤火取暖。由于一冷一热使体温产生极大反差,灌到肚子里的江水直往上泛,十几人开始呕吐起来。

陈瑞洪同志回忆:船刚要沉的时候,我还不怎么害怕。因为我从小在水乡长大,又熟悉水性。心想,我年轻体力好,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。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害怕。可是当我一下水就知道坏了,江水寒气逼人,风大浪急,还有漩涡。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。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,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,只留下一条短裤。经验告诉我,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。当时,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的尸体。人的呼救声、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。约过了40—50分钟后,江面上就寂静了。天气特别阴沉、黑暗,我看到远处有一道光线,便拼命游去,总是可望而不可及。

(下转7版)